

# 学术自由的双重维度

## ——高校自治与法治的边界界定及平衡逻辑探究

皮偲宇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2

DOI: 10.61369/SSSD.2025160038

**摘 要 :** 高校的自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架构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高校自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也日益明显。探究高校自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架构, 科学界定高校自治与法治的边界, 探寻其动态平衡, 对保障学术自由、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关 键 词 :** 高校自治; 学术自由; 边界界定

### The Dual Dimensions of Academic Freedom: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and Exploring the Logic of Balance betwee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Pi Siyu

Wuh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Foreign Affairs, Wuhan, Hubei 430202

**Abstract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is a crucial issu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With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ension betwee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Exploring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scientifically defining their boundaries, and seeking their dynamic balance are of key significance for safeguarding academic freedom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 university autonomy; academic freedom; boundary definition

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 其核心在于行政权力运行的法治化。高校法治本质上是行政法治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 既需遵循国家法治教育治理的宏观规范要求, 又需适配高等教育学术性、专业性的内在规律。大学自治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 通过保障学术共同体对教学、科研等核心事物的自主决策权, 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 一、高校法治的内涵范畴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科层制行政模式下, 行政被诠释为“执行与管理”的复合形态, 其核心体现为对政府计划、领导指示以及上级命令的刚性贯彻, 同时以全方位管控逻辑覆盖行政相对人。<sup>[1]</sup> 这一时期的行政权力呈现全能化特征, 从社会组织到个体行为均被纳入行政科层体系的直接或间接管辖, 最终衍生出“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行政主体”的依附性治理结构。这一特征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权力关系中尤为凸显。作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三大主体, 教育行政机关、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典型的行政主导关系网络: 第一, 高校被定位为事业单位, 实质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 在条块分割的行政隶属关系中, 其人、财、物配置及教学、科研等核心事务均受制于行政机关的指令性管理, 自主决策权极度萎缩; 第二, 高校内部管理呈现出浓厚的科层制权威色彩, 对教师的学术活动、职业发展以及学生的学习生活实施全方位干预, 个体在学术自由与发展空间上均受到严格限制。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 存在着种种弊端, 其实质上是一种“人治”。而正是“人治”的弊端促使我们向“法治”转变。在这一要求下, 高校法治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高校法治是指通过法律规范调整高校内外关系, 既保障学术自由与自治权的正当行使, 又防止权力滥用的治理模式。其内涵包括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维度, 体现了“规范约束”与“权利保障”的辩证统一。<sup>[2]</sup>

合法性要求高校行为符合法律程序与规范形式, 具体表现为: 1. 章程治理: 高校章程作为“校内宪法”, 需依据《高等教育法》第27-28条制定, 明确自治权利的行使规则, 并报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生效; 2. 决策程序法定化: 涉及师生重大权益的事项需履行听证、公示程序, 保障相对人知情权与申辩权; 3. 权力监督机制: 建立内部审计、信息公开制度, 对自治权运行进行过程性监督, 防止“暗箱操作”。

合理性强调法律对学术自由的正向保障与公共利益的优先维护, 具体体现为: 1. 学术自由的底线保护: 法律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干预学术研究、教学活动, 为创新创造保留空间; 2. 权

力制衡机制：通过法律划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防止行政权对学术领域过度渗透；3. 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当自治权行使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序时，法律可依法介入规制，体现“自由不得突破秩序底线”的法理逻辑。

## 二、高校自治的内涵及法律属性

自19世纪德国思想家、教育家洪堡提出“大学学术自由”理念以来，大学自治便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理念之一。<sup>[3]</sup> 高等教育理论认为，大学自治的合理性源于其作为“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场域”的本质属性——高深知识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唯有具备专业素养的学者群体，才能深刻理解其内在规律并自主解决该领域的问题。由此，大学自治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特有的治理形态，被视为保障学术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内涵指向大学作为法人实体，依法自主管理内部事务并排除外部不当干预的资格与能力。

保护学术自由构成大学自治的理论根基。<sup>[4]</sup> 从西方大学发展史看，“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呈现共生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价值内核，后者是前者的制度载体。具体而言，学术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通过制度化的保障机制抵御外部干预，而大学自治正是这一机制的核心架构——它通过赋予学术共同体自主决策权，为知识创新与思想碰撞营造独立空间。正如有学者指出，大学自治不仅是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更是其得以实现的初始条件与组织基础。<sup>[5]</sup>

在我国法律语境中，“大学自治”虽未作为独立概念被直接表述，但《高等教育法》确立的“高校自主权”与之具有实质同构性。该法通过列举式立法（如招生、学科设置、学术评价等权力），明确赋予高校自主管理的法律地位，其规范目的在于排除其他主体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为学术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支撑。这一制度设计既体现了对国际高等教育治理规律的借鉴，也契合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需求。

因此，可以认为，高校自治是学术自由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性表达，其实质是通过法律赋权保障学术共同体对专业事物的自主决策权。<sup>[6]</sup> 这一权利既具有宪法根基，也受法律规范的严格约束，呈现出“权利法定”与“有限行使”的双重属性，具体表现为：1. 高校自治的宪法基础：我国《宪法》第47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高校作为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其自治权本质上是宪法学术自由权的具体化与组织化——通过法律赋予高校独立开展教学、科研、学术评价等活动的资格。2. 高校自治的法律赋权：《高等教育法》第32-38条以列举式立法明确了高校自治权的具体范畴，包括：招生自主权、学科专业设置权、教学自主权、学术评价权。3. 高校自治的有限性：首先，高校自治必须服务于国家教育方针；其次，高校自治仅限于学术事务及相关内部管理，不得涉足政治、军事等国家专属权利领域；再次，高校自治行为需符合法定程序，违反程序即构成权力滥用。

## 三、高校自治与法治的关系逻辑建构

高校的自治与法治问题由来已久，关系复杂。<sup>[7]</sup> 高校法治是行政法治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而高校自治是学术自由的最核心的诉求，要实现高校的良好、可持续发展，必须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逻辑。

### （一）高校自治与法治的对立性：价值取向的内在张力

高校自治以学术自由为核心诉求，强调学术共同体对专业事务的自主判断权，追求知识生产的创新性与效率性；<sup>[8]</sup> 高校法治则是以秩序规范为根本导向，通过统一的法律规则约束权利的运行，侧重于权利保障的公平性与稳定性。这两者分别指向自由创新与秩序正义的二元价值范畴，内在蕴含着灵活性与规范性的天然张力。<sup>[9]</sup> 具体表现在：

标准层面：高校自主制定的学术评价标准可能与国家统一评级体系存在冲突，反映出专业判断与统一性要求的矛盾；

权利层面：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招生规模、专业设置的合法性审查，可能与高校基于学科发展需求的自主性调整产生矛盾，体现出行政权对学术事务干预的“合理边界”的争议。

### （二）高校自治与法治的统一性：目标导向的协同逻辑

不论是高校自治还是高校法治，二者皆是以保障学术自由为共同基点，以实现高等教育公共职能为最终目标。高校自治是通过学术自主机制释放知识创新活力，高校法治是通过规则框架防止权力滥用，二者共同服务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公共使命。具体来说，二者的功能呈现互补关系，表现在：

高校法治为高校自治划定底线：高校法治通过法律明确高校自治的禁区，例如查处学术腐败等，以保障教育公平。法律将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纳入刚性约束范围，确保高校自治不偏离公共价值轨道；

高校自治为高校法治填充内容：高校在法定框架内探索差异化治理模式，例如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特色学科评估体系等，为高等教育法治提供实践样本，推动规则体系的适应性演进。

### （三）关系逻辑的构建：高校自治与高校法治的动态平衡

以控制和限制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法治原则是防止行政专横并使行政活动合理化的有效手段，它为行政司法监督创造了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的条件。与之相对应的，如今高校与市场越来越接近，在这个过程中又对高校自治提出了新的要求。任何两件事物都不可能一元的对抗或一元的统一，高校自治与高校法治也是如此。高校自治与高校法治共同作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两者均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相适应的。但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不仅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并且要深刻意识到，这个平衡点应当是动态的。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以下几点：

1. 优化制度设计：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确“绝对自治领域”（例如学术自由表达、学科方向选择等）与“相对自治领域”（如招生计划制定、社会服务收费等），通过立法划定不可让渡的学术主权范围；同时建立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常态化对话平

台,通过专业设置听证、章程修订协商等程序,动态调整自治与法治的边界,将“事后冲突”转化为“事前共识”。此举不仅使高校法治为自治提供合法性确认与执法保障,也要求高等教育领域的所有管理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

2. 适用比例原则: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既有消极的方式也有积极的方式。<sup>[10]</sup>消极方式是指通过承认社会组织权利为政府权力设定边界,使政府权力不能逾越界限以保障社会组织权利。积极方式在于当权力滥用或使用不当时,社会组织可以依据法定权力进行积极的反抗或迫使政府收回权利的触角。据此,一方面,适当的扩大高校的学术自治权可以制约政府对高校学术的干扰;另一方面,在必要的领域增强政府的行政调控权则可以制约高校对学术自治权的滥用。在对学术核心事务可以实行“适当性干预”,除非涉及法律禁止性规定,行政权不得介入;而在招生、财务等涉及公共资源配置的领域,法治需要保持“必要性规制”,

但规制手段应与监管目标相匹配。

## 四、结语

本研究聚焦高校自治与法治的核心逻辑,通过规范分析与理论整合,揭示二者在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中的辩证关系:高校自治以宪法学术自由为根基、以法律授权为边界,本质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有限权利”;高校法治则通过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双重维度,既为自治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亦为学术自由构筑“不可侵犯的防护网”。分析表明,高校自治与高校法治,需以比例原则为平衡基准,通过法律保留机制明确自治权的核心领地,以协商调适机制动态化解规范冲突,形成“以保障促自治,以自治丰法治”的现代治理范式,从而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 参考文献

- [1] 尹凤英.行政法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3,19(01):91-92.DOI:10.16019/j.cnki.cn42-1578/g4.2013.01.087.
- [2] 邓世豹.论司法介入大学管理三原则——以大学对学生管理权为例[J].高教探索,2004,(01):26-28.
- [3] 徐小洲.博克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观[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6):124-131.
- [4] 徐靖.高校校规:司法适用的正当性与适用原则[J].中国法学,2017,(05):91-110.DOI:10.14111/j.cnki.zgfx.2017.05.005.
- [5] 王青斌.论高教法治与大学自治[J].行政法学研究,2006,(02):13-19.
- [6] 王建华.从理念到制度: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再思考[J].青岛化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5-10.DOI:10.16800/j.cnki.jqstss.2001.03.002.
- [7] 秦惠民.学术管理活动中的权力关系与权力冲突[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2,(00):170-181.
- [8] 张珏.试论大学的学术权力[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1,(03):5-8.
- [9] 郭为禄.张力与平衡:高校与政府法律关系的构建[J].江苏高教,2008,(03):17-20.DOI:10.13236/j.cnki.jshe.2008.03.013.
- [10] 李晏,杨洋.高校自治权的法律规制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04):55-60.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1.04.010.